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01

■ 毛泽东研究

论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①

王宇雄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两人根据各自对中国社会的定性实践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最终毛泽东的救国之路获得了成功。尽管从救国的角度而言,毛泽东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当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非简单的对错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梁漱溟;阶级对立;伦理本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001-07

On Both Mao Zedong's and Liang Shuming's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Society

WANG Yu-xi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believed that China was a society of class antagonisms, while Liang Shuming held that China was a society of ethics standard. Therefore, both of them were on a different road to save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Mao Zedong was successful in his road to save the nation. Though Mao Zedong succeeded in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society was not merely a simple matter of being right or wrong at that time.

Key words: Mao Zedong; Liang Shuming; class antagonism; ethics standard

一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问题追问的不同答案

毛泽东和梁漱溟均出生于1893年,他们成长于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之际,都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中华民族面临的困境和出路问题是他们乃至当时一大批爱国精英分子共同思考的问题。

(一) 毛泽东:中国的问题是阶级压迫问题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的农民家庭。其父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旧式农民^①。毛顺生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家庭的命运,在他身上固然有勤俭爱劳动的优点,但也有刻薄自私和固执己见的特点,他按照自己意愿为毛泽东设计了一条传统的发财立家的成长之路,但毛泽东通过和父亲的抗争,争取到读书机会,并走出了一条自我主张的人生成长道路。在与父亲的这种抗争中,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斗争意识,当他步入社会,看到种种不公,同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这种对农民生活的直接体认,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意识就成了促成其运用阶级观

^① 收稿日期:2014-07-12

作者简介:王宇雄(1970-),男,山西平遥人,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农民问题研究。

^①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时,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他家本来是属于贫农,但其父毛顺生克勤克俭地积累财产,逐渐由贫农转为中农和富农。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19.

点分析中国社会,激发穷苦、被压迫民众进行反抗的催化剂。

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曾经从“国民性”入手探讨中国问题,其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639}当时以毛泽东为主要骨干之一的学生团体“新民学会”,其主旨即在此。同样,在当时的氛围和知识界精英影响下,他也曾“鉴于军阀混战而提倡‘社会互助’,鉴于国事繁乱而主张‘多研究些问题’,鉴于社会阶级分化日趋明显而试验‘新村主义’”^{[2]127}。更进一步,于1920年6月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中,他指出统治者腐败不堪,成为引起国内动乱的罪根祸源,“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之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1]486}毛泽东有了抛弃中央政府,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样由总治到分治,在充分行使各省“主权”的基础上,恢复政治权威的构想。青年毛泽东就这样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不断追问着中国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刻变化,是在他第二次去北京读了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之后。他在1941年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378-379}读了这些书后,他对中国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的问题,并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思考中国问题,用彻底的革命观来求解中国问题,“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2}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对中国问题的求解过程中,不断深入思考,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后,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

(二)梁漱溟: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

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其父27岁中举,40岁入仕。梁漱溟的父亲和毛泽东的父亲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5]5}梁漱溟的父亲对其教育是正面引导,他认为好的,就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进行鼓励,他不同意的,也仅仅是让梁漱溟懂得他不同意而已,从不进行干涉。这样的士大夫家庭背景,使他延续了中国传统“士”的济世救民思想;宽松的家庭教育使其成长于完全轻松的家庭氛围中,没有获得来自中国传统的父权压抑的直接体认,而更多的是对家庭伦理亲情的体悟,这给他日后分析中国社会的范式埋下了认知的种子。

同毛泽东一样,梁漱溟抱着深深的民族情怀不断探求国家民族出路。他早年曾崇尚立宪,后来转为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希望中国通过革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看到的是辛亥革命胜利了,接下来的却是袁世凯专权,北洋军阀混战,社会混乱不堪,“辛亥以来,兵革迭兴,秩序破坏一次,社会纪纲经一度之堕毁,社会经济遭一度之斫丧。”^{[6]524}北伐战争成功了,接下来的却是国民党内部各个实力派的分裂和混战。一次次革命成功,并没有解决国权问题,国家反而更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他所期冀的通过革命建立稳固国权的愿望一次次落空。

这种乱象引发他对中国的问题本质的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个失序和秩序的重建问题,并非谁对谁革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7]210}

即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中国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文化上处于混乱状态。中国的问题当为“改造文化,民族自救”,而非武装斗争。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是秩序的改造。但这秩序的改造,每每必先之以某种势力的推翻。”^{[7]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却没有代表旧秩序的势力存在。中国没有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完全殖民地,侵略中国的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能一致针对中国形成彼此简单的两方面,它们不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国内四分五裂的军阀则本身就不代表一种秩序,“凡以军阀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以有钱有地的人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均属错误笑话。”^{[7]219-220}正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在找寻为什么中国通过一次次革命而无法确立起国权的过程中,梁漱溟从文化的视角找出中国原本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伦理秩序遭到了破坏,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无序。

二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分析的不同理路

(一)毛泽东:问题—理论—现状—历史—现实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对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和解决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厘清了中国的阶级状况,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回溯研究提供了中国社会为阶级社会的历史依据,通过对各阶级的深入剖析,深化了中国为阶级社会的观点。

如前所述,毛泽东由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找到了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但理论只是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武器,运用理论还需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具体分析。

出于认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以求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的目的,毛泽东于1925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他把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属于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属于半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属于农村无产阶级^{[8]3-9}。通过这样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就勾画出了一幅明晰的中国革命敌我友图谱,“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8]9}毛泽东富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法,梳理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初步表明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冲突的社会。这成为他本人乃至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处理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观点,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前提条件就是对中国阶级社会的建构和认可。为此,他回溯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对立性。在由范文澜等人起草而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中国社会”部分,回顾了封建时代的主要特点之后,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9]624}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的会。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在古代中国阶级社会的基础上,经过西方列强侵略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发展过来的。尽管传统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发生变化之后并没有改变其阶级社会的属性,只是有了新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只有运用阶级的观点才能认清中国问题,只有发动起阶级斗争才能解决中

国的问题。同样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做了阶级分析之后,对现实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各阶级在不同情况下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展示了各个阶级的政治生态,以及它们在中国社会结构和革命结构中的位置。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思路,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是属于有着明确阶级分野的阶级社会,而且阶级对峙和冲突比较突出,这样就给中国的民主革命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二) 梁漱溟:问题—历史—理论—现实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对问题的追问和解决为出发点,从中西对比的角度,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回溯研究,得出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不同的认知,构建起了其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社会的理论,并通过现实的分析得出了“伦理本位”被破坏,中国处于社会失序状态的结论。

如前所述,梁漱溟由一次次革命后的混乱无序,进而探寻造成失序的原因,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在其大作《乡村建设理论》的“甲部 认识问题”部分,梁漱溟介绍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乡村建设理论》创作于1932~1936年,体现的是这个阶段乃至更早时期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我们从中能看出他分析中国社会的理路。

梁漱溟由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困惑,秉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原则,回溯古代中国。他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老中国考察的结果为:习惯于集团生活的西洋社会游离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之间,而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也就无所谓个人问题,有的只是伦理关系。“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尔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10]168}西洋社会维系社会整体依赖于强制性的义务、纪律和法律,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利。中国社会则不同于西洋社会,表现为人们在生活中均以情感维系,皆以对方为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重视家庭亲情,非家庭关系拟家庭化,就连国家政治也以家庭情谊来体现,地方官被称为了父母官,以至于“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10]168},中国这样的社会即为伦理本位的社会。

梁漱溟指出,习惯于集团生活的西洋社会,中世纪有的是贵族与农奴两阶级的对立,近代为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的对立,而服膺于伦理的中国社会,则没有这样的对立:“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10]171}这样他就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结构,“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10]166}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10]174},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路径迥异于西方,没有形成过两大阶级对峙的状况。

自西方列强侵略以来,中国内部找寻国家民族出路的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一次次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冲击和破坏,破坏的结果是“伦理本位”社会的崩溃,中国社会“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10]208}。由于没有个固定的“理”可讲,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陷入无秩序的境地。到此时从历史沿传下来的中国,维系秩序恢复的传统社会机制——即“伦理本位”社会固有的秩序再造系统遭到了破坏,但通过革命再造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即像西方社会那样两大阶级对峙局面却没有形成,于是出现的只能是一个个没有阶级归属的纯粹武力集团。这类军事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突破,军事上的一时强盛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已有出路,反而会使得原本无序的中国社会更加无序。因此,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乡村建设就是旨在恢复和重建“伦理秩序”,奠定建国基础。

三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定性是基于不同话语体系对同一社会的不同建构

从1938年1月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的第二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互相承认对方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有一定认知,但认为对方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方面。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

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11]55}毛泽东则强调,“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而这共同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共性指的什么?就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11]55}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忽略了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对对方的看法断然否定。关于他们的分歧,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从他们服务于各自政治目的的角度进行了深刻解读,“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泽东思想分享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现代性话语。但梁漱溟却看到了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在的压迫性,他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是试图从普遍主义的历史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话语)中解救中国的社会。”^[12]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分歧,在二者对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歧的背后,还存在着对阶级概念的不同解读。

毛泽东于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剥削程度简明扼要地进行了说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是主要的;中农许多占有土地,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人;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有些全无土地,一般需租入土地来耕种,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9]127-129}。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所谓‘阶级’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由于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收入来源方面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差异。”^[13]

对阶级这个概念,梁漱溟有他自己的解读,“何谓阶级?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平等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10]170}他说的生产工具实际是指生产资料,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从事生产活动,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剥削,才能有阶级对立的局面出现。按照梁漱溟对阶级的界定,显然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那样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明显阶级对立。

由于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强调,以及运用不同的阶级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毛泽东和梁漱溟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各自的视角,运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对客观存在的同一社会进行了不同建构。从各自的话语体系来看,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认知的合理性,孰是孰非问题是难以说得清楚的。

四 毛泽东和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各自定性的救国实践探索的不同结果

如前所述,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属于阶级社会。在这样阶级明显对立和严重冲突的状况之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除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打败敌人别无它途。更进一步,在对各阶级关系厘清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性质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者为无产阶级,农民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者,前途为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继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系统的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决了梁漱溟于《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中所提出的,中国取法“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所无法解决的“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理论统一难”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梁漱溟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权一直建立不起来,是由于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没有两大对

立的阶级,人们的思想没有归属,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民国的建造和北伐战争党国的建造都归于失败。既然中国没有阶级对立,通过政党斗争的方式建国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如何来建国呢?比较有意思的是,尽管梁漱溟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截然不同,采取的建国道路根本不同,但他们的着力点都在农民和农村^①。梁漱溟指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是糊涂的”^{[10]104}，“中国社会一村一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6]911}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自然就把建国的目光投向了乡村,“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10]161}其乡村建设运动是要通过知识分子下乡,以乡学、村学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②,进而走合作生产之路,在解决农民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启发、培养农民参与政治的能力,重建业已崩溃的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以此奠定建国的基础。梁漱溟根据他的设想,于1931—1937年在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实验^③,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不得不中止实验,把乡村建设作为奠定建国基础的实验无果而终。

今天回看那段历史,十分清楚在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和平建设的途径建立起国权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拨开层层错综复杂的关系,运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起了中国社会对立的阶级关系,把“枪”置于了具有明确指导思想和理想社会追求,高度组织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使“枪”归于了有着明确阶级属性的组织,摆脱了梁漱溟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之后所看到的归于军阀个人的状况,走出了他认识到的近代中国革命的“怪圈”和“陷阱”。

五 结果不等于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业已给出了毛泽东和梁漱溟当年的争论一个明确答案。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社会的认识,通过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取得了成功,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社会结构,在解构旧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社会的新结构。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的认识,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在原有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进行修复性建构,而造就国家建设基础的想法和实验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成功了,梁漱溟失败了。

但是,梁漱溟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没有分化为西方社会那样两大阶级明显对峙局面的特点确实是客观事实。对此,当代研究农民问题的著名专家徐勇也曾指出,“中国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14]当然,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依据剥削关系来划分阶级,觉醒农民的阶级意识,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历史是有延续性的,通过革命的方式,在政治层面取得成功以后,可以解构旧的社会结构,建构新的社会结构,但支撑传统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可能随着政治革命的成功和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就销声匿迹,“文化和精神是历史生命的最深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物质与制度的变动并不直接地对它发生迅速的影响,亦即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2]16}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既有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又有一次的政治运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涤荡人们的固有价值观念,而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传统的东西又得到了恢复,就是较好的明证。

① 他们二者均重视农民问题,但对农民的定位不同: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梁漱溟把农民看作了其修复伦理秩序进行道德教化的对象,奠定建国基础而进行社会建设的基本力量。

② 梁漱溟认为,最先与外面接触而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上层动力,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下层动力,只有通过知识分子下乡对农民进行启发和引导,农民自身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进而中国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梁漱溟全集(第5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206—220。

③ 依附于现政权进行乡村改造,这本身和梁漱溟的初衷就是相违背的。他之所以要进行乡村建设,正是由于他看到现政权本身就是问题,并非解决问题的动力,他认为只有通过知识分子发动乡村建设运动才能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确立起国权奠定基础。但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一种权势力量寸步难行,不依附于政权进行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这是其乡村建设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继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的,毫无疑问,革命成功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但在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由于对现状不满继而回归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和颠覆性思维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也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已转入正常轨道的今天,我们应当理性地对待毛泽东和梁漱溟当年的分歧。他们二人对中国社会的定性不同,探索的结果也不同,但两人同样有着深深的忧国忧民情怀,找寻国家民族出路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尽管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四分五裂之际,梁漱溟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奠定国权建立基础的做法是不合时宜和于事无补的,但他对中国社会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切入进行的分析,不乏诸多深邃的有价值的见解。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曾指出,“如果某一传统内的改造潜力是巨大的,那么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对该传统的某些符号和价值经由改造还可提供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还可以在变迁过程中保留文化认同的意义。”^[15]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在和平建设时期其价值还是能够彰显的。也就是说,无论毛泽东认为的中国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还是梁漱溟认为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都是立足于一定视角对中国社会特征的深刻认识,对于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社会,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价值。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2] 萧延中. 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 梁漱溟.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6] 梁漱溟全集(第4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7] 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11] 汪东林.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 [12] 吕新雨. 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2):84.
- [13] 谢立中.“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J].江海学刊,2008(3):113.
- [14] 徐勇. 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1.
- [15]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校对 游星雅)